

【社会问题】

移民基础设施与南南流动：在穗非洲商人的制度身份困境、日常生活体验与能动性实践

王炳钰 卢燕璇

【摘要】基于“移民基础设施”视角，文章通过对在穗非洲商人的民族志研究，从“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基础设施三个维度探究其制度身份困境和每日生活体验，并探究其如何展演能动性以优化流动体验和轨迹。研究表明，流动个体面临着移民基础设施所带来的诸多约束和挑战，但仍能通过施展能动性策略应对基础设施障碍，从而对其生活图景和流动历程进行重置和重组。笔者旨在从“目的地基础设施”“日常生活”以及“能动性”三个维度对移民基础设施这一理论视角进行延展和突破，并将其引入南南流动与非洲商人在中国等研究议题，从而丰富和拓展其分析力度和厚度，进而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推动移民与流动研究领域的发展。

【关键词】移民基础设施；能动性；日常生活体验；南南流动；非洲商人在中国

【作者简介】王炳钰，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百人计划”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卢燕璇（通讯作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回流学者的工作与生活研究”（项目号17CSH049）科研助理（广州 510275）。

【原文出处】《广东社会科学》（广州），2021.2.190~204

导论

长久以来，从全球南方到全球北方的流动是世界移民的主导趋势^①。但近二十年来随着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紧缩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南到北的全球单向流动秩序受到撼动，世界范围内移民与流动的多元与不确定性趋势逐渐增强，“北南流动”与“南南流动”^②的格局也日渐浮现^③。在中国语境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与经济的日益繁荣，越来越多外国人开始进入中国^④。学者一般将来华外国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高技术人才，教育程度较高^⑤；第二类则是来自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相对薄弱的外国人，主要从事非高技术性劳动，被学者列入“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⑥的范畴。本文关注第二类来华外国群体，即全球南南流动背景下的来华非洲商人。

目前针对在华非洲人的研究根据研究视角和主题可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采用宏观的政治经济视

角，在中非关系的框架下关注中国政府对在华非洲人的治理与管控^⑦，并探讨其经济贸易活动^⑧。第二类研究则从社会适应与融入的角度出发，探究非洲人在中国的族裔聚居空间^⑨、社会网络^⑩以及跨文化交互体验^⑪。第三类研究开始探究在华非洲流动个体的日常生活与主体性流变。例如，Adams^⑫和Castillo^⑬等学者探究在华非洲个体的流动愿景如何被不断重塑；类似地，Liang和Le Billon^⑭的研究则剖析在华非洲人如何在饮食、交通以及身体交互等日常实践中协商和重构种族边界。上述研究表明，非洲人在中国的流动历程并非顺遂，他们面临移民体系和相关制度的严格管控、经济交易的摩擦以及当地社会的误解。总体来说，目前针对在华非洲人的研究多数从宏观层面关注其政策管理、跨国贸易与社会互动，微观层面活生生的、日常的生活体验相对未被完整剖析和呈现。在此情境下，从日常生活层面探究其流动历程和主体性的演变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因此,本研究引入“移民基础设施”(migration infrastructure)的理论视角探究来华非洲商人的制度身份困境、日常生活体验以及能动性实践。过去十年间,“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al turn)在移民与流动研究领域开始出现,并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关注。^⑤具体而言,项飙等学者^⑥将“移民基础设施”定义为推动(facilitate)或约束(condition)个体流动的一系列彼此相互链接的制度因素(institutions)、技术力量(technologies)、社会主体(actors)和关系网络(networks)。移民基础设施,作为崭新的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可以透视移民个体面临的多维度困境与障碍,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个体在不同流动阶段与时空的生活体验和流动轨迹。^⑦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从三方面对移民基础设施的理论视角进行延展和突破。首先,移民基础设施理论框架下的现有研究并未覆盖流动过程的全部环节。已有研究主要关注移民的出发阶段,移民抵达后的“目的地基础设施”(arrival infrastructure)^⑧还未获得足够重视^⑨。其次,已有研究倾向于在政治经济的宏观分析框架下关注移民基础设施对个体的管理和控制,相对较少从“每日层面”(everyday level)探究其如何重塑流动个体的生活体验。再次,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移民基础设施对个体流动的推动和限制,相对忽视移民个体自身的“能动性”(agency)展演。因此,本研究在移民基础设施的理论框架下,将着重从“目的地基础设施”“日常生活”以及“能动性”三个维度进行延展和突破。

基于项飙等学者对移民基础设施的分类,本研究关注“制度性”(institutional)、“实体与技术性”(physical and technological)以及“社交性”(social)三大类移民基础设施。通过对在穗非裔聚居区的民族志研究,文章关注三个问题。第一,中国移民体系和签证政策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给非洲商人的制度身份带来何种困境。第二,“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基础设施在日常层面给在华非洲商人的工作、家庭与社交生活造成的约束与限制。第三,在华非洲商人作为流动个体如何通过实施能动性策略来重塑和重建阻碍其生活的移民基础设施,以更好地优化其流动体验。

本文由此阐明,一方面,“制度性”“实体和技术性”以及“社交性”移民基础设施会给个体的流动过程及在地生活造成特定挑战和障碍,此种约束在南非流动的背景下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流动个体在面临诸多基础设施障碍的情况下仍有能力展演能动性,从而优化流动体验。本文旨在从“目的地基础设施”“日常生活”以及“能动性”三个维度对移民基础设施这一理论视角进行延展和突破,并将其引入南非流动与非洲商人在中国等研究议题,从而丰富和拓展其分析力度和厚度,进而在理论和实证层面推动移民与流动研究领域的发展。接下来,文章将针对非洲商人在中国和移民基础设施进行文献回顾,在此基础上建构理论框架。第二部分介绍样本构成和研究方法。第三部分基于移民基础设施视角呈现在穗非洲商人的生活图景以及能动性展演。最后一部分为主要结论。

一、文献回顾

(一)来华非洲商人

20世纪60年代起非洲商人逐渐形成了全球“商业迁移链”:从本国出发,先在非洲大陆积累资本,之后以欧美国家为主要贸易区,80年代后开始转战东南亚,亚洲金融风暴后逐步转向中国。^⑩已有研究指出,非洲商人进入中国有以下原因。第一,欧美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日益收紧限制了其流动路径。^⑪第二,非洲国家长期以来与中国保持良好的外交合作关系,中非贸易的兴起与繁荣为非洲商人创造了到中国积累财富的机会。^⑫与此同时,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凭借相对优质的产品与低廉的成本吸引了大批来华非洲商人。^⑬第三,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步放宽对外来流动人口的限制。^⑭

广州作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城市,凭借独特的区位与产业优势成为中国最大的非洲人聚居地。^⑮根据广东省公安厅的数据,截至2018年9月25日,广州实有在住外国人8.3万人,常住人员(居住半年以上)5万人,其中非洲国家人员1.5万人,占在穗外国人总数的18.8%。^⑯具体来说,在签证类型方面,来华非洲商人大多持有效期为90天至1年不等的商务签证,每次逗留不超过30天;签证临过期时需要离境更新签证或回国重新申请签证。^⑰在地理分布上,

聚居区主要包括小北和三元里。近年来部分非洲商人开始迁往周边地区(如佛山黄岐镇)居住,但小北和三元里仍是其贸易、社交的主要场所。^②在国家分布上,广州的非洲商人主要来自非洲西部和南部,如尼日利亚、加纳、刚果等。来华经商的非洲人可分为坐贾和行商,经营商品主要为纺织品、化妆品和电子产品。^③这一群体多为独自流动的未婚男性,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及以上,语言以英语、法语为主,主要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④

除了想象中的机遇之外,非洲商人的流动历程充斥政策体制以及社会适应与融入等方面的困难与挑战。首先,在宏观政策方面,随着中国移民体系的不断成熟和完善,来华非洲商人在出入境许可与签证申请上受到严格管控。^⑤Lan的研究指出,地方政府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在居住和贸易活动层面对来华非洲商人进行限制。^⑥除此以外,他们还是当地警方打击“三非”的重点对象。^⑦其次,来华非洲商人出于以下原因在社会适应与融入方面面临诸多障碍与挑战。^⑧其一,语言文化的差异与障碍造成并加深了当地民众与非洲人之间的隔阂;^⑨其二,传统上以中国为中心的种族意识形态以及偏好浅色皮肤的大众审美都使黑皮肤的非洲人受到一定程度的污名化和边缘化;^⑩其三,非洲人在大众话语和媒体中容易被塑造为威胁社会稳定和居民生活的人群^⑪。同时,由于非洲商人大多出于经济动机来到中国且逗留时间较短,主动融入当地的意愿较低,他们更多地保持“过客”身份,依附当地的非洲社群以建立贸易和社交网络。^⑫在此情境下,部分非洲商人通过饮食^⑬、社区组织^⑭、宗教信仰^⑮以及跨国婚姻^⑯等方式来应对种种社会适应和融入过程中的挑战。另外,针对非洲商人在中国的经济现象,现有研究主要分为以下立场。第一,族裔飞地理论(ethnic enclave theory)认为跨国移民在流入地形成独立的经济空间;^⑰第二,桥梁理论(bridge theory)认为在华非洲移民的空间聚集为流入国和流出国搭建了语言、文化与经济关系的桥梁,有利于中非友好关系的发展^⑱。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主要从宏观国家政策、社会治理以及社会网络等角度关注非洲人在中国的身份现状、社会适应与贸易活动,较少从个体的层面关注

其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体验。尽管已有学者开始关注来华非洲人的主体性流变,但非洲流动个体的能动性实践尚未得到充分关注。因此,本研究将从移民基础设施的视角出发,从微观、日常和个体的层面深入探究在华非洲商人面临的移民基础设施障碍,以此呈现其生活图景并着重关注其如何施展能动性策略来优化自身流动体验。

(二)移民研究的“基础设施转向”

项飙等学者将基础设施概念引入移民与流动领域^⑲,并将移民基础设施划分为五类:“商业的”(commercial)、“管制的”(regulatory)、“技术的”(technological)、“人道主义的”(humanitarian)以及“社交的”(social)^⑳。Collins指出,“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al turn)提供了更广阔全面的视角以理解移民基础设施在生产、推动、约束与再生产流动个体的流动轨迹、模式与体验中的复杂性与交织性。^㉑换言之,作为理论分析工具,移民基础设施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流动个体如何在实践中被组织起来,并借此识别各种约束、依赖以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

基于已有研究,本文重点关注三类移民基础设施:制度性(institutional)、实体与技术性(physical and technological)以及社交性(social)基础设施。在本研究中,“制度性基础设施”涉及相关移民体系、签证政策以及法律规定。“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施”指在目的地拥有特定载体的基础设施,包含三方面:其一是移民在目的地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如族裔聚居区相关设置,包括贸易商厦以及非洲餐厅等;其二是目的地的交通设施,如公交、地铁等;其三指的是以信息技术为承载的各类通信软件,如WhatsApp、微信等。“社交性基础设施”则具体指非洲流动个体在目的地的社会关系网络。

正如导论中所提到的,本研究从三方面对移民基础设施这一理论框架进行延展和突破。第一,本研究更关注流动个体抵达流入地后影响其生活的“目的地基础设施”^㉒。在移民基础设施框架下的研究大多将重点放在流动个体在输出国语境下的出发阶段。^㉓然而,移民的到达并不意味着流动过程的终结。相反,目的地移民基础设施深刻地形塑着流动个体在当地日常的流动体验与轨迹,包括其生活节奏、交通

及饮食习惯、社会交互方式以及身份寻求等。因而,对于目的地基础设施的探究有助于丰富移民基础设施的概念意涵和增强该理论视角的分析力度。

第二,本研究不仅关注“从上到下”(from the above)的制度性移民基础设施,而且关注更加无形和看似普通的基础设施,并重点从日常维度来研究其对于流动个体生活体验的影响。正如 Xiang 与 Lindquist 指出,移民的过程应该被看作是“每日的”(quotidian)和“动态的”(processual)。^⑧然而大部分在基础设施框架下进行的研究一般在宏观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框架下进行,并过度强调移民和移民基础设施的商业性和制度管控维度。^⑨因此,近来有学者开始提出不应该只关注人们习以为常的国家政策、移民中介以及机场等基础设施,也应探究相对无形和容易被忽视但极其重要的其它类型的移民基础设施,比如工作环境、电子通信技术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⑩因此,本研究将不仅关注制度性基础设施,而且同时探讨实体和技术性以及社交性基础设施如何形塑流动个体的日常生活节奏与惯习以及主体性。

第三,本研究还重点关注流动个体本身如何施展其能动性来应对基础设施的障碍和挑战。一般来说,移民基础设施这一理论视角的关注重点并非流动个体本身,而是基础设施如何限制、推动以及管控个体的流动方式和轨迹。但部分学者开始指出,相互链接的制度、技术和网络等移民基础设施在影响个体流动体验的同时,也可以被个体的能动性意愿、策略和行为所重塑和重建。^⑪也就是说,流动个体并非被动地承受移民基础设施施加的种种影响和作

用,而可以能动积极地“重建”移民基础设施以更好的规划其流动轨迹和战略。因此,本研究将关注流动个体的能动性维度,以更全面有效地推动移民研究领域的基础设施转向。

正如图1所示,本研究将从“目的地基础设施”“日常生活”以及“能动性”三个维度来拓展和延伸移民基础设施这一理论视角在移民研究领域的应用和发展。具体来说,本文重点关注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三大类移民基础设施,来考察在华非洲商人的制度身份困境、日常生活体验以及其能动性策略的实践。进入实证数据分析前,文章将先介绍样本构成和研究方法。

二、样本构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实证数据主要来源于2018年11月至2019年12月在广州小北、三元里等地针对非洲商人的民族志研究。作为当前非洲人在中国的最大聚居区,广州具有成为田野点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广州的小北和三元里(见下页图2),靠近主要交通枢纽(如广州火车站)和商品集散地,且周围店铺租金相对较低,因而吸引了大规模非洲商人的聚集。小北地处广州市越秀区,天秀大厦、越洋商贸城以及金山象商贸城等都是非洲商人的主要贸易场所。三元里位于广州市白云区,非洲商人主要集中在唐旗、迦南、通通等服装城。

具体而言,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观察、深度传记式访谈以及实物分析三种方法。第一,以参与式观察为核心的田野笔记构成本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以广州的外国人管理机构为载体的制度性基础设施,机场、公交和通信设备等为载体的实体与技术性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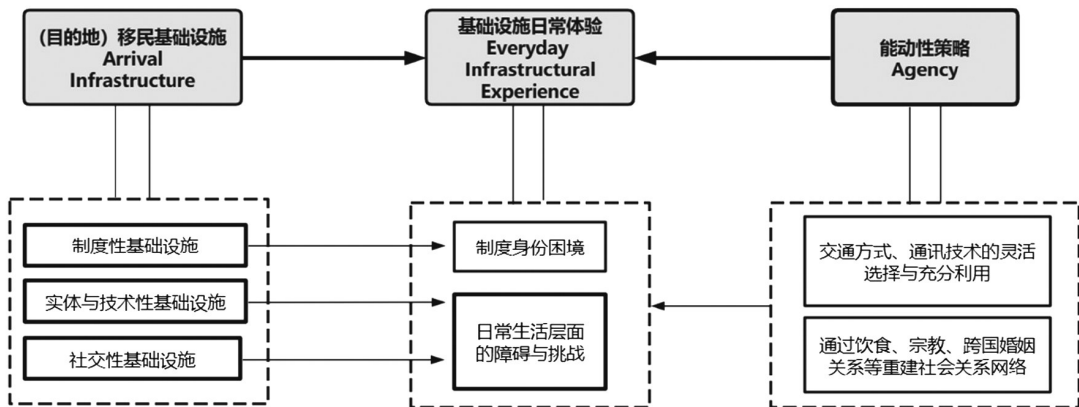


图1 理论框架



图2 田野点的地理分布

(资料来源:高德地图)

基础设施,以及承载非洲商人主要社会关系网络的教堂和非洲餐厅等,都是本研究的观察与记录对象。与此同时,不同维度的基础设施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如何作用于流动个体的生活体验和身份寻求,也是笔者在实地田野中的研究和分析重点。

第二,针对深度访谈,研究采取目的性抽样方式(purposive sampling)招募受访对象。其中,小北、三元里与石室圣心大教堂^⑨作为非洲商人的主要聚集地而成为寻找受访对象的场所。本研究一共访谈了15位非洲商人,其中13位男性,2位女性,其受教育程度大多在高中及以上,大部分具有宗教信仰。在国籍方面,受访者来自非洲多个国家,其中尼日利亚8位,赞比亚与马里各2位,乌干达、多哥和乍得各1位。在居留时间方面,受访者的来华时间不一,其中3位在半年以内。访谈主要使用英语,采取面对面和线上两种形式,访谈时间在半小时到两小时之间。访谈关注三个主题。第一,受访者基本信息及其流动历史和轨迹。第二,受访者与广州的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移民基础设施的互动体验,以及不同基础设施如何形塑其日常生活体验。第三,受访者如何展演能动性克服种种基础设施障碍。此外,为更深刻理解非洲商人在中国的生活图景,笔者同时访谈了与非洲商人互动的其他主体,如中国店主、出租车司机以及中非家庭的中国女性等共7

位。表1为受访者的基本信息。

表1 受访者社会人口属性信息表

非洲商人	平均年龄	35岁	
性别	男	13	
	女	2	
国籍	尼日利亚	8	
	赞比亚	2	
	马里	2	
	乌干达	1	
	多哥	1	
	乍得	1	
来华累计时间	半年以上	12	
	半年以下	3	
教育水平	高中以下	3	
	高中及以上	12	
婚姻状态	已婚	11	
	未婚	4	
中国店主	3		
出租车司机	2		
中国妻子	2		

第三,本研究采取的实物分析法涉及正式文件资料和相关图像的纪录和获得。正式资料包括各层级政府机构针对在华外国人特别是非洲人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和统计资料等,如201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等。此外,笔者也通过开展视觉民族志,对相关基础设施进行了拍照记录并生成大量图像信息,以辅助对于参与式观察和访谈所得数据的分析和解读。

三、基于“移民基础设施”视角:在穗非洲商人的生活图景与能动性探究

(一)制度性移民基础设施:在穗非洲商人的制度身份困境

近二三十年来,中国逐步完善移民制度与签证政策体系,也渐渐成为外国移民日益青睐的目的地国家。^⑩在中非贸易联系不断增强与中非外交友好的背景下,中国的相关制度性基础设施为非洲人进入中国提供现实可能并为其在华日常生活提供诸多制度保障。但与此同时,实证数据表明,非洲商人在中国仍面临一系列制度身份困境。

具体来说,在国家的移民体系与签证政策上,大部分来华非洲人属于符合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从事临时性、季节性、非技术性或服务性工作的外国人。^⑪依据移民分类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的管理规定,非洲商人主要持商务和旅游的短

期签证进入中国。2012年中国新颁布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还将八类普通签证细分为十二类。其中,商务签证重新划分为F(居留期为6个月)和M(停留期为3个月)两类,来华从事贸易活动的非洲商人主要通过商务M签进入中国,M签可多次延期办理,但办理周期较长,且存在被拒风险,这意味着非洲人的签证期限与居留时间被进一步压缩。过短的签证有效期限往往是非洲商人在华进行贸易的一个主要障碍。^⑤很多受访者表示,无法在签证过期前完成交易的高风险以及离境再次申请签证的高成本都使他们持续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与此同时,非洲商人因签证过期成为“三非”(非法入境、非法居留、非法就业)人群的风险有所升高。“三非”人群一旦被发现,便可能面临巨额罚款与入狱风险。当地法人、组织与公民也在“三非”人群的管控中被赋予一定的监督责任。来自公众的日常监督也给在穗非洲商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一定压力。由此可见,来自移民体系和签证制度层面的限制和管控可能给非洲商人的来华流动历程带来不确定性和暂时性,使他们陷入制度性身份困境,进而阻碍其在华进行资本积累的流动愿景。

在地方管理层面,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与公安部门对在穗非洲商人进行特定的管理和服。小北的外国人综合服务中心为在穗外国人提供住宿登记的同时,还为其提供签证换发、使馆联系、交通指引等信息服务,并组织各类中文学习课程,帮助合法停留与居住的外国人更好地适应与融入当地的生活。与此同时,签证检查作为公安部门对在穗非洲人进行管理与监督的主要环节,可能给少数流动个体的工作与社交生活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⑥受访者Amy(女,28岁,多哥,来中国五年)^⑦便曾向笔者谈及朋友在社交场所遭遇证件检查的经历:

“我有个朋友有一天晚上跟一些朋友去pub,然后玩到2点钟的时候,警察来这边……查证件……后来我也听我朋友说,就查了护照,他们没有什么违法犯罪……我也有这种经验,以前有很多,现在也有一些,慢慢就习惯了。”(访谈时间:2019年5月27日)

Amy的话语及其朋友的经历表明非洲流动个体与制度性基础设施互动的过程存在某些摩擦,这种

摩擦影响和塑造其日常生活体验以及社会融入和归属感的寻求。事实上,本研究中其他受访者也分享过类似的经历。与此同时,其他研究也指出,来自当地政府的制度管理可能会给在穗非洲商人带来一定程度的日常生活上的困扰和不便。^⑧部分非洲商人可能因此考虑重塑其流动轨迹,如选择迁往广州周边地区(如佛山黄岐镇)与中国其他省份城市(如义乌)。^⑨

上述政策与案例分析表明,以国家移民和签证体系以及地方管理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在推动非洲商人跨国流动的同时,也可能对部分在华非洲人的流动历程以及流动体验产生某些特定的影响。一方面,国家移民制度与签证体系对在华非洲商人的流动范围、时间期限以及模式进行明确规定与管理,少数非洲流动个体进一步的流动轨迹与战略由此受到一定限制。其次,地方管理机构给流动个体提供了特定社会服务帮助其实现社会融入的同时,也可能在管理过程中给其带来某些消极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进一步促使其重塑和重组移民愿景。^⑩

(二)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移民基础设施:在华非洲商人日常生活图景

在日常生活层面,主要影响流动个体在目的地国家生活体验的移民基础设施为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基础设施。在本研究中,“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施”(physical and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包括三类,第一类是非洲商人在中国的工作与生活设施,第二类是非洲商人在中国使用的主要交通工具,第三类则是各类通信技术软件。社交性基础设施则包含非洲商人内部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与中国人的关系网络。

针对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施,在工作与生活设施层面,小北、三元里等非裔聚居区为非洲商人提供了熟悉且便利的生活环境。第一,聚居区内的商铺招牌语言以中文为主,辅以英文、法语和阿拉伯语,一定程度上帮助非洲商人跨越了语言障碍。第二,商贸城内商品种类齐全,主要面向非洲市场,方便非洲商人集中采买。第三,中国商铺在营业时间上也配合非洲商人的生活作息。第四,聚居区内的多家非洲餐厅也为非洲商人提供非洲风味的食物。

在交通方式层面,发达的公共交通体系与其他私人交通工具的出现使得非洲商人在广州的日常出

行较为方便。一方面,出租车、公车、地铁等公共交通将小北、三元里、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关键枢纽串联起来,为人员、货物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另一方面,小北、三元里的私家车、三轮车、电动车等非正式交通工具也为非洲商人提供出行服务。但在此过程中,部分非洲商人也面临特定的基础设施障碍。以广州的公共交通为例,公车、地铁在采用普通话、粤语和英语等多种语言提供指引的同时,也给流动个体出行带来潜在的挑战。正如受访者Jan(男,26岁,乌干达,在中国七年)指出的:

“因为我们国家和非洲不使用地铁系统……很多人刚来不知道如何使用它们。我也去过地铁,那是在北京,那里太拥挤了,人太多,队伍太长。我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它……大多数来这里的人,都是第一次坐地铁,所以有点困难。”(翻译,访谈时间:2019年11月28日)

Jan的事例指出,广州的交通设施与其之前生活的国家和城市的交通体系的区别,使很多非洲商人在日常出行时面临特定的基础设施挑战。事实上,交通体系差异所带来的基础设施障碍在初次抵达的流动个体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笔者曾在田野调查中遇到非洲商人Rash(女,45岁,尼日利亚,来中国两天),由于刚抵达中国,Rash对中国和广州的交通体系缺乏相应的了解,因而无法自主应对搭乘地铁等交通程序。在此过程中,其跨国贸易也难以顺利开展。这一系列障碍也深刻形塑Rash等非洲商人在流入地的日常生活体验。

在通信技术层面,针对移民基础设施的已有研究对此讨论较少,仅有的研究也主要关注通信设施如何被应用到对移民的信息监控中。^⑤本研究显示,通信技术等基础性基础设施对非洲商人个体的生活体验有着深刻的影响。

第一,非洲商人进入中国后需要学习与使用当地的主流通信软件。具体来说,中国大陆主要使用微信。本研究中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提到中国独特的通信软件给他们的跨国家庭和亲密关系维系以及日常工作和社交带来的诸多障碍和不便。正如Will(男,30岁,赞比亚,来中国半年)初次来华所深刻感受到的:

“我来这里之前并不知道微信。……当我

来到这里,我很惊讶,什么都不起作用了,我无法收到来自赞比亚的消息,也不能发信息。”(翻译,访谈时间:2019年9月3日)

第二,非洲商人进入中国后还需要应对中国更为独特的移动支付方式。以微信和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在中国的诸多生活场景都得到广泛应用,成为中国的主流支付方式。以餐饮为例,顾客可以在自助点餐终端下单,麦当劳就是其中的典型。然而依据本研究的调查,喜爱麦当劳的非洲商人在点餐过程中更多是人工下单而非自助点餐。支付方式上,现金与POS(Point of sales)机支付仍是非洲商人所习惯的支付方式。总体而言,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施在为非洲商人营造积极的工作与生活环境的的同时,也在交通工具和通信技术的使用等方面带来了某些障碍,这些障碍也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着流动个体的工作、家庭与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

针对“社交性基础设施”(social infrastructure),非洲商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在长距离的跨国流动中发生了断裂。^⑥前文指出,非洲流动个体在中国面临的通信落差会在一定程度上阻断其与流出国家人、朋友的联系。与此同时,尽管以往研究指出基于族裔、国籍的商会等社团组织在凝聚非洲商人群体中的积极作用^⑦,但本研究的实证数据并未指向这一点。一方面非洲部分国家在广州可能并未建立商会,另一方面非洲商人群体间的关系十分复杂,有学者指出,非洲商人间的社会网络兼具合作与竞争的双重特征^⑧。在此情境下,非洲商人便开始尝试与中国社会的不同主体进行互动,包括中国商家、出租车司机以及当地民众等,但他们在跨文化交互过程中也面临着种种障碍和挑战。首先,中国商家是非洲商人在华互动最频繁的群体,二者有着密切的贸易合作,与此同时双方也可能产生摩擦与冲突。受访者Har(男,50岁,乍得,来中国一个月)这样说道:

“(中国店主)他们得到了钱,所以他们很友好……只有钱……当交易完成时,他们会‘wowowo’(拟声词,表达嫌弃的态度),当你到那家商店,说‘开个价’,他说200元,你说100元,他们又会‘wowowo’(语气不好)。”(翻译,访谈时间:2019年5月27日)

Hara的事例揭示出非洲商人与中国商户间社会

交互的工具性特征,较少能建立情感性的社会联系。同样地,非洲商人与部分中国出租车司机的互动也时常出现纠纷与冲突。Hara(男,50岁,乍得,来中国一个月)曾谈到自己对部分广州出租车司机的看法:

“有时甚至是最近的地方,(出租车司机)他们只是开了一小段路,也收很多的钱。如果他说了我的坏话,因为他说的是中文,所以我听不懂。但我也不会说他的坏话。”(翻译,访谈时间:2019年5月27日)

Hara的话语点出了影响非洲商人与出租车司机关系的两种因素:其一,语言障碍影响了双方的交流过程;其二,部分出租车司机对非洲人存在某些特定的偏见。这种偏见可能使得部分出租车司机以不同方式对待非洲乘客与中国乘客。笔者在小北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常可以见到这样一幕:非洲商人招手等待出租车,部分空车司机选择视而不见。此外,部分非洲商人也尝试与当地居民进行互动。但依据已有研究^⑥与本研究的调查,一些片面的看法也可能深刻形塑非洲商人与当地中国居民的社会互动。具体而言,部分居民对非洲流动群体存在刻板化印象,认为非洲人“素质”普遍较低。在远离小北、三元里区域的地铁、公车等公共场域,当有非洲人上车,乘客总会投去好奇的眼光,正如Amy(女,28岁,多哥,来中国五年)所说的,“每天都有人盯着你看,好像你是一个动物一样”(访谈时间:2019年5月27日)。

综上,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这两大类移民基础设施在给非洲商人日常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也造成了部分障碍和困境。在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施方面,交通体系的差别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在华非洲商人获得积极的日常流动体验,通信软件的落差更是给非洲商人跨国家关系的维系和社交关系网络的建立造成了挑战。在社交性基础设施层面,非洲商人在目的地的族群网络建构与跨文化交互过程也不时充斥着摩擦与冲突。但是值得指出的是,在探究移民基础设施给流动个体带来限制和挑战的同时,本研究也表明,非洲商人作为流动个体并非被动地接受移民基础设施给其日常生活所带来的阻碍,而是尝试通过一系列能动性策略来优化和提升其在华生活体验。

(三)“重建”移民基础设施:非洲商人的能动性展演

本研究不仅关注移民基础设施如何形塑流动个体的日常生活,也强调流动个体在应对移民基础设施障碍时的能动性策略。通过对实证数据的分析和梳理,本文主要点明和关注以下两大类能动性策略。第一,非洲流动个体灵活选择交通方式并充分利用各种通信软件;第二,他们通过饮食、宗教、亲密关系等维度延展和重组自身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这两种能动性策略,非洲商人积极地应对流动过程中的基础设施障碍,以达到“重建”或者优化其所处移民基础设施的目的。

第一种类型的能动性策略首先体现在非洲商人在不同的交通方式间进行策略性转换。当非洲商人遭遇某种交通方式(特别是公共交通)的挑战时,他们可能转而选择其他私人的交通工具。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尝试与当地一些非正式的电动车司机建立起非正式的经济关系,以避免其他交通方式带来的潜在不便。与此同时,共享单车作为新兴的交通方式也成为部分非洲商人的能动性实践对象。笔者在广交会和小北、三元里等地的田野调查过程中,时常可以见到非洲商人借助共享单车进行日常通勤。通过交通工具的灵活转换与充分利用,非洲商人得以在目的地更顺遂地开展贸易和社交活动。

同时,在第一种能动性策略实践里,部分非洲商人还通过对不同通信软件的策略性应用以重塑其社会关系网络。这种策略性应用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各类通信工具重新接入原有的社会网络,二是尝试学习和使用目的地的通信工具,以延展在当地的社会关系网络。在维系跨国家关系方面,非洲商人主动借助聚居区内的通信服务重新接入家乡的社交媒介。电话、邮件等通信设施也被非洲商人能动地利用以实现与在非洲的家人以及朋友的互动。在与当地主体建立跨文化关系网络方面,微信等技术性基础设施则成为其能动性展演的重要空间和渠道。下文Jan(男,26岁,乌干达,在中国七年)的话语生动展现了他在不同通信软件之间的转换:

“我需要在这里和我的国家之间保持平衡。

我在网上和我的家人联系……我们使用另一个应用程序……我可以直接给家人打电话……但

是对在中国待了很长时间的其他朋友,我总是使用微信(和他们联系)。”(翻译,访谈时间:2019年11月28日)

与Jan的情况类似,本研究中的其他受访者也能动地利用微信等通信软件来建立和扩大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其中,他们通过使用微信软件的文本翻译功能来跨越语言障碍,从而推动自身贸易和社交活动的顺利进行。事实上,相关研究也指出,互联网等技术性移民基础设施有利于帮助流动个体链接与整合社会关系网络,促进在当地的的社会适应和融入。^⑧

非洲商人的第二种能动性策略,体现在其通过饮食、宗教以及跨国亲密关系等方式重构其社会关系网络。首先,饮食往往代表特定的文化身份,作为一种纽带连接流动个体与流出国的文化。小北、三元里的非洲餐厅则成为非洲流动个体实践其能动性的空间。Will(男,30岁,赞比亚,来中国半年)在回顾初次到广州的情景时,便提到饮食在其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所以我(来到这里)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我在中 国要吃什么,但也祈祷我能找到青豆、肉、胡萝卜所有这些东西。我花了大概一个月的时间才安顿下来。我和食物做斗争。在外面我可能去麦当劳,肯德基,或者去小北买我的鱼。”

(翻译,访谈时间:2019年9月3日)

可以看到,肯德基、麦当劳等国际化餐饮和广州当地的非洲餐厅都成为非洲商人寻求身份认同的渠道。学者Ho对在华非洲留学生的饮食研究指出,非洲食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提醒非洲人“家”的存在,国际饮食则帮助非洲流动个体建构全球化的身份。^⑨整体而言,饮食成为非洲商人施展能动性的重要方式之一。饮食将个体安置于更广阔的文化网络中,透过饮食而获得身份变换和寻求,流动的非洲个体拥有了更多的情感归属、文化链接以及社会网络支持。

其次,宗教仪式的参与给非洲商人提供了情感寄托以及重塑族裔关系网络的可能。第一,宗教仪式开始前,很多非洲商人会选择作为志愿者参与到仪式筹备中,小北附近的先贤清真寺还设立了外籍穆斯林志愿者服务站;第二,仪式开展过程中,通过

学习、合唱与互助,非洲商人形成凝聚性的宗教社群。第三,仪式结束后,宗教场所又成为非洲流动个体进行社交互动的空间。Amy(女,28岁,多哥,来中国五年)利用石室圣心大教堂的周日英文弥撒活动与其他非洲伙伴组织各种形式的见面和聚会。由此可见,非洲流动个体有能力借助移民基础设施的空间,建构某种文化归属感并跨越特定的社交障碍重塑与重建其社会关系网络。

此外,部分在穗非洲商人还通过与中国女性建立跨国亲密关系以获得来自家庭的情感支持,并由此重构其在华的社交性基础设施。Chi(女,33岁,广东湛江,来广州8年)在访谈过程中回顾自己和丈夫建立亲密关系的起源:

“他来中国没多久就开始追我,没到三个月两个月吧,开始找中国人,想找中国老婆,然后要追我。就直接跟我讲,我很喜欢你,你介意吗?差不多就这样。”(访谈时间:2019年2月18日)

Chi的事例与笔者的田野调查表明,在中非家庭的亲密关系中,浪漫的想象并不是全部,其中还可能充斥一定的工具性策略。^⑩也就是说,通过与中国女性结为伴侣,一方面非洲商人可以申请在华居留时间更长的签证类型(如Q签^⑪)延展其居留时间,另一方面,与中国女性结婚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来自跨文化群体的情感与社会支持。正如前文所述,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和社交性基础设施会给流动个体的日常生活带来特定的挑战。与此同时,非洲流动个体在面对移民基础设施障碍时,并非被动地接受,而是通过一系列能动性策略的展演来重塑与重构其在目的地的移民基础设施,进而优化其流动轨迹与流动体验。但不得不指出,在南南流动的背景下,作为进入中国的非高技术性流动个体,非洲商人能动性的展演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一系列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结构性因素的制约和限制。其中,流动个体个人层面的社会人口属性,比如性别、年龄、收入、国籍以及流动历史等层面的异质性会导致其施展能动性的意愿和能力程度存在差异。

结论

本研究基于对在穗非洲商人的民族志研究,从制度性、实体与技术性以及社交性基础设施三个维

度探究其制度身份困境和流动体验,并探究其如何展演能动性以优化流动历程和轨迹。首先,以中国移民制度和签证体系为代表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给非洲流动个体的身份寻求、流动体验与流动愿景的实现带来一定程度的制约。其次,日常生活层面,实体与技术性基础设施中交通方式的挑战以及通信技术的落差限制着非洲商人的跨国工作、家庭与社会生活。与此同时,社交性基础设施层面,非洲流动个体在跨文化语境下与同族裔群体以及中国社会主体的互动过程充斥诸多障碍。但与此同时,本研究进一步指出,流动个体能够通过特定的能动性策略应对基础设施障碍。非洲商人的能动性首先体现在交通工具和通信方式的灵活使用与策略性转换,其次体现在通过饮食、宗教信仰与跨国亲密关系获得情感支撑,并延展和重塑其社会关系网络,以优化其日常生活体验与流动历程。

基于此,本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在理论层面,本研究通过关注“目的地移民基础设施”(arrival infrastructure)、“日常生活”(everyday)以及“能动性”(agency),从而拓展和丰富了移民基础设施在移民与流动研究领域作为重要理论分析框架的力度、深度和广度。首先,已有研究大多在输出国语境关注移民基础设施对流动个体的管控和约束,本研究则将重点放在个体到达目的地后,深刻剖析和探究“目的地移民基础设施”(arrival infrastructure)如何影响与形塑流动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其次,移民基础设施框架下的研究一般在宏观的地缘政治和社会经济框架下强调移民基础设施的商业和制度管控维度,本研究同时也探讨实体和技术性以及社交性基础设施如何在日常层面形塑流动个体的生活节奏以及主体性。再次,本研究还关注流动个体针对移民基础设施障碍的能动性(agency)展演。流动个体的能动性在移民基础设施的研究中相对被忽视,但正如本研究和学者Thieme^②的研究所表明,移民基础设施不应仅被理解成为政府部门或者移民中介控制流动个体以及生产特定流动方式的手段和工具,也应该被看作流动个体本身进行资本积累和获得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本研究显示,南南流动的背景下,非洲商人在面临严格的移民与签证

体系管控下,仍能通过实施能动性应对不同类型的移民基础设施阻碍,以此优化其日常生活体验和流动历程。那么,南南流动语境下的其他流动群体乃至其他高技术移民流动个体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发挥能动性值得进一步探究。能动性的探讨,将成为移民与流动研究领域“移民基础设施转向”的新的拓展维度。

第二,在实证层面,对在华非洲人的现有研究多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关注在华非洲人的贸易活动、制度管理以及社会适应等话题,对个体活生生的日常生活体验关注相对较少。因此,本研究重点从日常层面探讨了移民基础设施对流动个体生活图景的影响和塑造,从而更加细致和全面地呈现了在华非洲商人的流动历程和体验。同时,基础设施的已有研究大都将实证焦点放在从全球南方流动到全球北方的移民和流动群体,而对于南南流动这一日渐浮现的移民格局尚未重点关注。由此,本研究对来华非洲商人的研究则在实证层面上进一步推动了移民与研究领域的“基础设施转向”。此外,随着中国在国际范围内经济实力和国家声望的日益增强和提高,进入中国的外来移民数量也将逐步增多,因此本研究有利于为国家移民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提供重要的实证启示和参考。

注释:

① Wang Bingyu, "A Temporal Gaze towards Academic Migration: Everyday Times, Lifetimes and Temporal Strategies amongst Early Career Chinese Academic Returnees," *Time & Society*, vol. 29, no. 1 (February 2020), pp. 166–186; Wang Bingyu, "Time in Migration: Temporariness, Precarity and Temporal Labour amongst Chinese Scholars Returning from the Global North to South,"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vol. 46, no. 11 (August 2020), pp. 2127–2144.

② “北南流动”指全球北方国家(Global North)(即发达国家)向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即发展中国家)的人员或商品的流动。“南南流动”指全球南方国家(Global South)(即发展中国家)间人口或商品的流动。

③ Wang Bingyu and Jingfu Chen, "Emotions and Migration Aspirations: Western Scholars in China and the Navigation of Aspirational Possibilities," *Journal of Ethnic and Migration Studies*, (May 2020), DOI: 10.1080/1369183X.2020.1764841.

④ Leonard Pauline and Lehmann Angela, "International Migrants in China: Civility, Contradiction, and Confusion," in Lehmann Angela and Leonard Pauline eds., *Destinatio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⑤ 刘云刚、陈跃：《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移民政策：评述与展望》，上海：《世界地理研究》，2015年第1期。

⑥ ③ Mathews 将非洲移民的跨国流动称为“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低端全球化”涉及较少资本的人员和货物的跨国流动，通常与发展中国家有关，主要指非正式、半合法或非法的交易。参见 Mathews Gordon and Yang Yang, "How Africans Pursue Low-End Globalization in Hong Kong and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1, no. 2(June 2012), pp. 95-120.

⑦ Haugen Heidi Østbø, "Nigerians in China: A Second State of Immobil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0, no. 2(January 2012), pp. 65-80; Lan Shanshan, "State Regulation of Undocumented African Migrants in China: A Multi-Scalar Analysi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0, no. 3(June 2015), pp. 289-304.

⑧ Bertoncello Brigitte and Bredeloup Sylvie, "The Emergence of New African 'Trading Posts' in Hong Kong and Guangzhou," *China Perspectives*, no. 1(December 2007), pp. 94-105; Bodomo Adams, "The African Trading Community in Guangzhou: An Emerging Bridge for Africa-China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3(September 2010), pp. 693-707; Marfaing Laurence and Thiel Alena, "Networks, Spheres of Influence and the Mediation of Opportunity: The Case of West African Trade Agent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7, no. 10(May 2015), pp. 65-84; Haugen Heidi Østbø, "From Pioneers to Professionals: African Brokers in a Maturing Chinese Marketplace,"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The Online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17, no. 4(February 2018), pp. 45-62.

⑨ ⑤ ④ Li Zhigang, Lyons Michal and Brown Alison, "China's 'Chocolate City': An Ethnic Enclave in a Changing Landscape," *African Diaspora*, vol. 5, no. 1(January 2012), pp. 51-72; 李志刚、薛德升、Michael Lyons、Alison Brown：《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北京：《地理学报》，2008年第2期；李志刚、薛德升、杜枫、朱颖：《全球化下“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例》，北京：《地理研究》，2009年第4期。

⑩ 许涛：《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北京：《青年研究》，2009年第5期；牛冬：《“过客社团”：广州非洲人的社会组织》，北京：《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2期；周大鸣、许多天：《结构洞视角下在穗非洲导购中介商社会网络研究》，北京：《民族研究》，2017年第3期。

⑪ ③ ④ 周阳、李志刚：《区隔中融入：广州“中非伴侣”的社会

文化适应》，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⑫ Adams Jama Carlton, "Structure and Agency: African Immigrants in China," *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vol. 7, no. 10(May 2015), pp. 85-108.

⑬ ② ③ ⑥ Castillo Roberto, "Landscapes of Aspiration in Guangzhou's African Music Scene: Beyond the Trading Narrative,"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4, no. 4(September 2015), pp. 83-115.

⑭ ③ ⑥ Liang Kelly and Le Billon P., "African Migrants in China: Space, Race and Embodied Encounters in Guangzhou, China,"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vol. 21, no. 5(September 2018), pp. 602-628.

⑮ ④ Collins L. Francis, "Regional Pathways: Transnational Imaginaries, Infrastructures and Implications of Student Mobility within Asia," *Asian and Pacific Migration Journal*, vol. 22, no. 4(December 2013), pp. 475-500.

⑯ Lindquist Johan, Xiang Biao and Yeoh B. S. A., "Introducti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Migration: Brokers, the Organ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Asia," *Pacific Affairs*, vol. 85, no. 1(March 2012), pp. 7-19; Xiang Biao and Lindquist Johan,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8(September 2014), pp. 122-148.

⑰ Lin Weiqiang, Lindquist Johan, Xiang Biao and Yeoh B. S. A.,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igrant Mobilities," *Mobilities*, vol. 12, no. 2(March 2017), pp. 167-174; Robertson Shanthi, "Infrastructures of Insecurity: Housing and Language Testing in Asia-Australia Migration," *Geoforum*, vol. 82(March 2017), pp. 13-20.

⑱ ④ Meeus Bruno, Arnaut Karel and van Heur B., *Arrival Infrastructures: Migration and Urban Social Mobiliti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9.

⑲ ④ ⑤ Robertson Shanthi, "Infrastructures of Insecurity: Housing and Language Testing in Asia-Australia Migration," *Geoforum*, vol. 82(March 2017), pp. 13-20.

⑳ Bodomo Adams and Enyu Ma, "We Are What We Eat: Food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ty Formation and Identity Shaping among African Traders in Guangzhou and Yiwu," *African Diaspora*, vol. 5, no. 1(January 2012), pp. 3-26.

㉑ ⑥ Haugen Heidi Østbø, "Nigerians in China: A Second State of Immobil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0, no. 2(January 2012), pp. 65-80.

㉒ Lan Shanshan,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Rac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City & Society*, vol. 28, no. 3(December 2016), pp. 298-318.

② Li Zhigang, Laurence J. C. Ma and Desheng Xue, "An African Enclave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New Transnational Urban Space,"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vol. 50, no. 6 (November 2009), pp. 699-719.

②⑥ 参见广州出入境管理局的数据: http://www.sohu.com/a/274340852_177402, 2018年11月9日。由于部分在穗非洲人属于非法入境或逗留, 很难统计在穗非洲人的实际数量。

②⑦ Niu Dong, "Transient: A Descriptive Concept for Understanding Africans in Guangzhou,"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vol. 17, no. 4 (February 2018), pp. 85-100. 另外, 还有部分非洲商人持旅游签证(有效期为7-30天不等)或学生签证(以延长在中国逗留的期限)。

②⑧⑨ Lan Shanshan, "State Regulation of Undocumented African Migrants in China: A Multi-Scalar Analysis,"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50, no. 3 (June 2015), pp. 289-304.

②⑩ 李志刚、薛德升、Michael Lyons、Alison Brown:《广州小北路黑人聚居区社会空间分析》, 北京:《地理学报》, 2008年第2期。

②⑪⑫ 柳林、梁玉成、宋广文、何深静:《在粤非洲人的迁居状况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广州、佛山市的调查》, 北京:《中国人口科学》, 2015年第1期。

②⑬ “三非”人员指“非法入境、非法居留和非法就业”的外国人。参见 Haugen Heidi Østbø, "From Pioneers to Professionals: African Brokers in a Maturing Chinese Marketplace," *African Studies Quarterly: The Online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vol. 17, no. 4 (February 2018), pp. 45-62。

②⑭⑮ Lan Shanshan, "Transnational Business and Family Strategies among Chinese/Nigerian Couples in Guangzhou and Lagos," *Asian Anthropology*, vol. 14, no. 2 (September 2015), pp. 133-149.

②⑯ Lan Shanshan,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Race in China: A Case Study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Communities in Guangzhou," *City & Society*, vol. 28, no. 3 (December 2016), pp. 298-318.

②⑰⑱ 牛冬:《“过客社团”: 广州非洲人的社会组织》, 北京:《社会学研究》, 2015年第2期。

②⑲ 马恩瑜:《从广州非洲人餐饮活动透视其文化特性》, 北京:《非洲研究》, 2014年第1期。

②⑳ Castillo Roberto, "Homing' Guangzhou: Emplacement, Belonging and Precarity among African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vol. 19, no. 3 (May 2016), pp. 287-306.

㉑ Haugen Heidi Østbø, "African Pentecostal Migrants in China: Marginalization and the Alternative Geography of a Mission Theology," *African Studies Review*, vol. 56, no. 1 (April 2013), pp. 81-102.

㉒ 邱昱:《清洁与危险: 中-尼亲密关系里的去污名化技术和身份政治》, 广州:《开放时代》, 2016年第4期。

㉓②④ Bodomo Adams, "The African Trading Community in Guangzhou: An Emerging Bridge for Africa- China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vol. 203 (September 2010), pp. 693-707.

㉕ Lindquist Johan, Xiang Biao and Yeoh B. S. A., "Introduction: Opening the Black Box of Migration: Brokers, the Organization of Transnational Mobility and the Changing Political Economy in Asia," *Pacific Affairs*, vol. 85, no. 1 (March 2012), pp. 7-19.

㉖②⑤ Xiang Biao and Lindquist Johan,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48 (September 2014), pp. 122-148, S124; S143.

㉗②⑥⑧ Khan Marina, "Mapping Migranties: A Discursive Mapping Approach to Analyse Lived Experiences of Skilled Migration Infrastructures," Working Paper, no. 1 (2020).

㉘ 石室圣心大教堂位于广州市越秀区, 是当前天主教在广州教区最宏伟的大教堂。每周日下午, 教堂面向外国教徒举办英文弥撒。

㉙ 宋全成:《非法外国移民在中国的现状、症结与对策》, 济南:《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1期。

㉚ 2016年中国尝试对在华外国人分类, 具体而言, A类是外国高端人才, B类是外国专业人才, C类是符合国内劳动力市场需求、从事临时性、季节性、非技术性或服务性工作的外国人。其中, 非洲商人主要属于C类。

㉛ 本研究所有受访者的姓名都进行了匿名化处理。括号中的信息依次为性别、受访时年龄、国籍、受访时来华时间。下文因循此模式。

㉜ Pollozek Silvan and Jan Hendrik Passoth, "Infrastructuring European Migration and Border Control: The Logistics of Registr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at Moria Hotspot,"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vol. 37, no. 4 (August 2019), pp. 606-624.

㉝ 许涛:《广州地区非洲人社会支持的弱化、断裂与重构》, 广州:《南方人口》, 2009年第4期。

㉞ 许涛:《广州地区非洲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行动逻辑》, 北京:《青年研究》, 2009年第5期。

㉟ Elaine Lynn-Ee Ho, "African Student Migrants in China: Negotiating the Global Geographies of Power through Gastronomic Practices and Culture," *Food, Culture & Society*, vol. 21, no. 1 (December 2017), pp. 9-24.

㊱ Q 签面向家庭成员的团聚。

㊲ Thieme Susan, "Educational Consultants in Nepal: Professionalization of Services for Students Who Want to Study Abroad," *Mobilities*, vol. 12, no. 2 (March 2017), pp. 243-258.